



上海三联文库
学术系列
Shanghai Sanlian Wenku Xueshu Xilie

社会转型 与当代知识分子

陶东风 著

Shanghai

Sanlian

Wenku

Xueshu

Xilie

上海三联书店

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

陶东风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

著 者/陶东风

责任编辑/汪 宇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顾崖清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85 千字

印 张/12.25

印 数/1—5100

ISBN 7-5426-1203-4

I·152 定价 18.5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陶东风 著.-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1999

ISBN 7 - 5426 - 1203 - 4

I . 社… II . 陶… III .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IV .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643 号

多元与沟通(代前言)

——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 问题的对话

王 蒙 陶东风

陶：9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的，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首先，这三者的变

革速度是不同步的，以经济为最快，文化次之，政治滞后，而且有些在经济领域实行的改革被明确规定不能相应地用于政治或文化，所谓市场经济只是经济手段而非制度，两个文明一起抓等都包含有这方面的意思。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的状态与异质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其结果之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就是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对这个社会作出完美的、准确无误的解释与评价，因为我们所处的不是从前那样的同质化的社会，而是高度异质化的社会。想要发明出或者寻找到一种无所不包的、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的阐释模式是不可能的。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多元的、各种不同的阐释模式的相互宽容、共存，它不但容忍而且呼唤异质的阐释模式与评价标准；但是同时又努力在不同的模式与标准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对话关系，在多元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沟通。90年代文化界的一个弱点，在我看来就是缺少对话的规则与诚意，各家各派自说自话，众声喧哗，热闹有余而对话、沟通不够。许多人过于相信自己的阐释模式或价值标准是绝对正确的，其有效性是无限的，把不同于自己的阐释角度、价值尺度一棍子打死。这种态度只会把文化的讨论引入歧途，大家都意气用事，为争论而争论，是非常不利于真正的文化批评的建设的。

王：你说到的有些大问题我不准备多谈。但是有一点我深有同感，就是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以及为政治服务的文化之间可以相互解释得很协调；但现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单质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搞自由经济，还强调公有制以及原来的社会主义的东西。现在的情况则多了几个层面。从政策上讲，新闻自由一直被认为是自由化口号，从自上而下的政策看，没有多少的变化。但是现在的新闻显得不同于从前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的影响就很突出。即使像《光明日报》那样的中央报纸，也有很大的变化，原因是销路越来越少，所以也要多少变得面目可亲。中国现在的表达自由的状况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这不算是什么阿谀。

陶：这就是经济的变革所产生的文化上的乃至于政治上的效应。这也是中国的特色。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不能直接用政治的或文化的方式来解决，甚至不能用政治的或文化的话语来分析、表述。然而经济领域的变化会自然而然地波及政治与文化。比如您刚才说到的《光明日报》的变化（其实相似的变化在其他的官方报纸也在发生），首先是起于经济上的考虑（如发行量的问题）。当许多文化单位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以后，它就再也不能不考虑市场了，结果是报纸或其他文化承载与传播形式在思想内容上发生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针对报纸、刊物思想内容的文化政策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多，经济也会自然地促使它变化。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当文化事业单位在经济上变化以后，其制度、政策事实上已经部分发生变化，不是单质而是多质了，或者叫“双轨制”（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意识

形态上的计划性)。因而其体制的延续方面与变化方面面临重新“磨合”的问题,这是今天许多文化单位面临的新课题。

王: 我觉得,历史上许多很可怕的文化状况的形成也不仅仅在于体制、政策与当权者,而在全民、全国在革命名义下,或在意识形态名义下形成的意识形态狂热。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不是靠打小报告或家家安窃听器来控制,而是自己控制自己,这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中的人总是把革命的对象视作豺狼虎豹,而把革命的领袖视作红太阳。我觉得这种“红太阳”效应是一种革命的效应,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革命。人不能在一种怀疑的、批判的、理性状态下投身革命。一面在痛击国民党,一面又十分理性地反思共产党的每个举措,这是不可能的。我曾经有这个体会。为什么说现在比过去享有了更多的空间?因为现在人们对于红太阳的敬畏的确被更理性的态度所取代了。这一点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一个最可贵的进步。现在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偏执、狂热、简单化有所超越,实事求是地用一种更实际的眼光来看待每个人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解放思想,比之于有没有人盯梢更重要,这是一种更实际的自由。

陶: 您说的这种自由是不是可称为内在的自由?虽然我一直认为,没有制度的保证,内在的自由常常不能落实,但是我觉得并不能说有了制度的保证,就一定有内在的自由。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能认同您的观点。我们在反思过去的教训时,固然不能说过去的不自由是或主要是人们的内心没有自由,所以被人剥夺了自由,这是为专制体制开脱的说

法；但是人的内在的解放，的确也是十几年来（尤其是思想解放以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否可以这么说，在内心比较自由，有理性、有怀疑精神的情况下，即使外在的环境不怎么自由，他也至少可以不做或少做破坏自由、与自由背道而驰的事情。

王：但是狂热的降低同时出现了文化道德失范，理想主义的式微，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为私利而活，不是服从某种意识形态了。对于这种局面，各人的估价是不一样的。我确实没有有意要成为文化讨论中一方的代表人物，但从对我的观点持批评态度的朋友中也受到一些启发，其中之一是意识到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精神饥渴，他们的感觉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肚子”里没有“食物”，所以急需呼唤人文精神，以此充实自己的空虚。而我的心情是，我好不容易从精神膨胀、从“红太阳效应”中稍稍解脱出一点，可以喝一点茶或吃一根冰棍了，我再也不想吃什么十全大补丸了。所以这一方面的感受是极为不同的。不过我有这种感觉并不要求大家也都要有这种感觉；启发之二是，我从许多朋友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体会到，改革开放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令人忧虑的方面。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靠反改革是搞不垮改革的，改革搞垮了一定是由于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太低，或被腐化，使得改革开放走到歧路上去。改革开放可以打倒改革开放，比如权力拜物教照样可以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作用。如果你要为改革开放辩护，但连不该辩护的也去辩护，就会葬送改革开放。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陶：这涉及对于改革开放的界定，到底什么是“改革开放”？卖淫嫖娼是改革开放么？假公济私是改革开放么？权钱交易

是改革开放么？在有些使用这个词的人那里，这个词是无所不包的，举凡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不管好坏，也不管是什么，无不可以归入“改革开放”，或至少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就发生了你所说的问题：你要为改革开放辩护，那么好，当前社会的所有负面现象（比如道德堕落、治安混乱等等）都要由你负责，或者是你所拥护的。因为一切都放入“改革开放”这个大兜子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倒是急需来一番“词语梳理”，不要把所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叫做什么“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这个词也混乱不堪），不要把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负面现象都说成是市场经济或改革开放的结果，其实这当中许多（比如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恰好是旧体制的产物，是改革开放要加以消除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从理论上对于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加以界定，这种界定一方面可以对改革开放的实践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防范有人利用这个概念的含义不清，把什么都扣到它的头上，让它承担不该承担的罪名、恶名、臭名。有了清晰的界定，就可以把不应由“改革开放”负责的的东西从这个词中排除出去。

当然，界定的目的并不是要调动所有美妙的词汇，把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描绘得天花乱坠，从而把改革开放不适当当地美化、神化，这样也会失去这个词，以及这个词所表征的社会变迁的具体、真实的含义。改革开放的确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像“王宝森现象”之类的东西决不能扣到改革开放的头上，恰恰相反，王宝森现象正是改革开放要排除的东西。因为健全法制、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自然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多只能说，王宝森之类的当权者利

用了改革开放的不完善所提供的机会,但是一般人往往不作这样的区分。我们既不否定市场经济的确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文化价值、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也拒绝由市场经济来承担本来不该由它承担的罪名、恶名。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现在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道义、正义掌握在那些批判市场经济的人手中,这是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正义”等概念的含糊不清有极大的关系。笼统地说改革开放的拥护者或者反对者是没有意义的。

王: 这也是我的文章让反对者反感的一点。他们觉得我在为市场经济辩护。他们责问: 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过市场经济或改革开放? 似乎我有一种暗示, 他们是反对市场经济的。这是最近一二年的讨论中表现出来的问题: 各执一词。而所执者都带有常识性。比如有些人的文章反复讲, 经济上去了, 并不等于一切就都解决了。要不就是认为, 不要视市场经济为完全正确。其实这些都是常识, 谁也没有说经济上去了一切就都跟着上去。我在 10 年前的文章中就讲过。所以, 争论中的双方其实在许多问题上并无重大的分歧, 不过强调的面向不同。比如我说某人头发黑, 另外一些人说他皮肤黄, 就这样双方争执不下, 都视对方为白痴或不明事理。有时是相互把对方逼到死角。你说他头发黑, 我就偏说他皮肤黄, 黄得不得了。有时候是作者自己的偏执、激情加幻想把自己逼入死角, 逼到了不是我矫情就是你堕落, 不是我聪明就是你疯狂的地步。

陶: 而且硬说你不承认这个人皮肤黄。

王: 对, 争论中有时有这样的情况, 你强调一面, 另一面就变成我的了。其实对对方的观点并不是持反对意见, 或并无不

同。各执一词、各强调一个方面不利于对话的进行。

陶：你说的让我想起现在有一种观点，说“左”当然不好，但是不“左”不等于就是好。我觉得很好笑。谁也没有说不左就等于好，这难道还用论证么？就像得肝炎当然是属于身体不健康，但是不得肝炎当然不等于健康，还可能得阑尾炎、肺炎或别的什么炎。但是如果在肝炎大面积流行过一次后，多谈谈防止肝炎的必要性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王：再比如我说了一些为王朔辩护的话，似乎我要树的大旗就是王朔，而有人为了反对我，就不顾一切地批王朔，似乎我成了王朔的辩护士，或者认为我把中国新文化的希望寄托在王朔身上。但是经过了这一年多的争论后，我现在起码是心平气和地承认：你说他头发是黑的，谢谢，他头发是黑的。你说经济上去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谢谢，我也这么认为。你说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我太谢谢你了，市场怎么是完美无缺的呢？但是我现在反过来说，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来促进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的自由的空间的拓展，我相信他们也没有异议。

陶：这就涉及到一个争论的基本规则的问题。争论的双方都必须意识到或承认：对待一个对象，尤其是异质的复杂对象的任何阐释角度或评价尺度都是有局限的，当然也都有它独特的有效性。任何尺度与视角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都有自己独特的有效性、深刻性，但是这种有效性与深刻性又只能限于一定的范围或“区域”。就是说，当你选择了一个角度，你在获得特定的优势的同时也进入了一定的局限或“盲区”，但你为了写文章说问题，又不可能不选择角度，甚至也不能为了克服限度、变得全知全能而企图将所有的角度都

“一网打尽”、“尽收眼底”。这也是一个个体所无法克服的“阐释的命运”。如我在前面说的，从理论上讲，任何人恐怕都无法把我们的社会阐释透彻。事实上，就一个人而言，全方位常常意味着无方位，全角度意味着无角度。这不是说全方位与全角度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在一个人的视野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无必要、无意义的，与其说它意味着全面，还不如说它代表浅薄（所以我并不因此而主张中庸）。所谓全方位与全角度，只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与方位的对话、沟通与互补中形成，而这种对话互补关系的形成，又有赖于每个个体意识到自己的阐释角度的局限性，并承认别人的阐释角度的有效性，从而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别人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与胸襟，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这样，一个人的阐释可能是有局限的、不全面的，而在不同的个体之间综合而成的阐释就能够比较全面地阐释这个社会，就较少局限性，比较准确地反映当今这个社会的特点。所以我们倒不必要求提倡人文精神的人也都要面面俱到地既讲市场经济的积极面，也讲它的消极面。

王：对对，这样就变得是我在逼人家了。

陶：同时他们似乎也无必要要求您非得多谈谈市场经济的负面性。在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争论中，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阐释与评价尺度，即道德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它们所看到的都只是对象的一个方面，用您的比喻说，是头发黑或皮肤黄。其实头发黑与皮肤黄都是对象的一方面特点，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全人”。现在的许多误读现象就是缘于缺少对对方的“同情的理解”，于是产生你说的“逼入死角”。比如，就我所知，世俗精神论者并不认为市场经济或世俗文

DG79/10

目 录

多元与沟通(代前言)

——关于当代文化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对话 王蒙 陶东风

导 论

1. 知识分子与社会变革 1
2. 阐释中国的焦虑 4
3. 现代化与民族化
 ——现代性冲击与文化认同危机(之一) 6
4. 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
 ——现代性冲击与文化认同危机(之二) 10
5. 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15
6. 在悖论中思索 18

第一章 被迫的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的两难

——兼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种取向	21
1. 文明冲突与认同危机	21
2. 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紧张	
——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困境	26
3. 实用主义与强力崇拜	30
4. 西方思想与本土经验	36
5. 知识分子的五个传统	42
6. 世纪末的思索：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	46

第二章 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保守主义 55

1. 保守与保守主义	56
2. 被纳入文化民族主义的保守主义	73
3. 中国保守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向	80
4. 关于“新保守主义”	86
5. 后殖民主义的误区	88

第三章 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激进主义

——兼论传统与自由的关系	95
1. 激进与激进主义	95
2. 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	97
3. 中国现代语境中的激进主义	101
4. 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悖离	103
5. 中国激进主义的法国思想资源	106
6. 传统与自由	
——来自哈耶克的启示	109

7.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对激进主义的批判	122
8. 顾准与西方自由主义	127
9. 另一种反思	133
 第四章 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	 137
1. “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	139
2. 作为“世俗精神”对立面的“人文精神”	142
3. 超越秩序与世俗秩序的紧张 ——知识分子的激进反世俗姿态分析·之一	148
4. 文化资本的争夺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知识分子的激进反世俗姿态分析·之二	152
5. 世俗化在中国的历史意义	167
6. 超越市场/文化的二元论	171
7. 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畸变	186
8. 世俗时代的终极关怀 ——世俗化问题再思	193
9. 第三种立场：超越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二元对立	199
 第五章 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	 203
1. 一个话题的提出	203
2. 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内涵	205
3. 作为审美乌托邦的道德理想主义：意义与限度	207
4. 道德优先性原则的误区	211
5. 如何面对现代性的吊诡？	215

6. 诗人应当对谁愤怒?	220
7. 仇恨俗人不是真正的宗教情怀	224
8. 多元与宽容是有限度的吗?	230
9.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理想的建构 ——新理想主义的提纲	233
10. 多元社会中的道德共识 ——关于新理想主义的一点补充意见	246
11. 信仰与世俗社会: 来自洛克的启示	252

第六章 中心与边缘的位移

——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	265
1. 知识·社会结构·权力	266
2. “士大夫”的一统天下(古代)	291
3. 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近现代)	294
4. 被批判的是被重视的(约 1949 – 1979)	301
5. 社会转型与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约 1980 – 1998)	302
6. 精英结构转换的历史意义	310
7. 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312
8. 从相互独立到良性互补	321

[附录] 文化研究: 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

1. 文化研究: 在学科之间游走	327
2. 文化研究的特征	330
3. 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	336
4. 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	342

后 记